

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河

贾平凹 / 著



平



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浮

贾平凹 著

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躁/贾平凹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5063 - 4733 - 4

I. 浮… II. 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6023 号

浮 躁

作 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懿 翎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贾平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 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 千

印张: 29. 2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33 - 4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序一

穿过本土，越过“废都” ——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

陈晓明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无疑是汉语文学的奇观，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如此卓异的文字风格，无不令人称奇。不用全盘性地梳理他的全部作品，只要从他的《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所喻示的路径，贾平凹几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变异的见证。那样的历程，是他的心路历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微妙精深的一段精神传记。他身上汇集的问题、矛盾与启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贾平凹的这些作品，我们就没有脚踏在当代中国汉语言文学的坚实的土地上。

当然，在贾平凹的写作史中，最绕不过去的就是《废都》，它不只是理解贾平凹创作的轴心，也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作品。它所汇聚的矛盾，它所引发的争论事件，实际上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学面临的困局，也是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重新出场的标志性事件。今天重读贾平凹这“三部”作品，也是重新进入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变革史的一种努力，如同是做一次历史语义学的阐释。岁月如此荒凉，只有从历史碎片里攫取微言大义，我们才能勉强保留一份历史谱系，或许可以从中看清面向未来的道路。

一 穿过本土文化的“性情”

如果说到汉语小说的本土性或民族特色，贾平凹无疑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本土性或民族性在文学价值评价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夸大它的作用，则把自己区隔于传统封闭的领地；完全无视它的存在，也不能显示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文学贡献。当然，我们会说，文学就是文学，所谓的本土性或民族特色也只能是在文学性的构成的整体中去认识，也就是说，既要在西方已经形成的文学审美价值体系里去认识它，同时又在相互参照中去看到汉语文学的独特性。

大多数本土性或乡土性都经不住这样的双重解析。只有贾平凹可以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尽管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迷惑。贾平凹素有“鬼才”之

称，他的小说文章，看似平淡自然，实则诡异奇崛，鬼斧神工。其缘由大抵在于他的作品总是有着独异的文化底蕴，他的文字总是可以引领人们进入神奇怪异的地界。

梳理贾平凹的写作史是困难的，他的作品数量如此庞大，尤其是他的出色之作如此之多，当代中国作家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在二十一岁那年发表了可能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一双袜子》，该作发表在一份地方刊物《群众艺术》上，手笔很是稚拙。1978年发表《满月儿》获得当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这在当时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此后数年，贾平凹作品甚多，但无惊人之处。直到1983年以后，贾平凹连续发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鸡窝洼的人家》《黑氏》《远山野情》《天狗》《人极》等作品，他找到自己写作的根基与路数。“寻根”给他提供了历史契机，他的古旧而无多少时代气息的“商州”地域文化突然间有了时代的依据。那些“山野风情”，以实录笔法，寻常道来，游龙走丝，下笔成形，倒是别具一格。那时的文坛，为“本土文化”所困，都竭尽全力，去寻民族的生存之根。有寻“优根”者，有寻“劣根”者，以期响应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国内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诘难。当然，归根结蒂是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作一番文化上的通盘考虑。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擅长作这些宏观雄伟的思虑，纵横古今，坐而论道，以天下为己任，文学当然也是经国之大业。贾平凹偏居西北，有地利之便。那时他沉下心来查录十八本商州地方志，发现商州历史悠久，出过“乌骓马”，虽是胯下之物，毕竟“追风逐日”；更有玉环客死马嵬，这又是文化丰厚之佐证。“寻根”让贾平凹有了底气，贾平凹这才看清自己的天然优势，责怪世人，何以不管商州地理内情？有这些“文化”垫底，商州地界的寻常琐事，自然浸含文化的原汁原味。他的那些“地缘文化”占据有利地形，可以出奇制胜，比人技高一筹。

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贾平凹比那时的“寻根派”要更高明些，他并不把文化当作全部，文化只是他的一个原料，一个背景。所以，在我看来，贾平凹并不是扎根本土，而是穿过本土——本土不是他困囿其中的一方地盘，而是他任意穿行的大地。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奔“性情”而去，他要在性情中流露出民俗风习，要在风土人情中展现出人性。贾平凹一开始就没有让历史断裂，没有在文化寻根与新时期的文学人性论之间划下沟壑，只有他弥合了这两个时期却没有沦为落伍者。这就是贾平凹，既聪明过人，又偏执顽强。有文化作底蕴，原来被认定为封建落后乃至迷信谶纬的那些现象，现

在已经没有进步尺度作为压制，贾平凹借助地理风情，下工夫去发掘那种文化状态中的人们的心灵美德，高尚情操；同时细致刻画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恋。要强调正面道德化的意义，那就必须在强调道德的纲领下来进行，贾平凹一开始就精通写作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使贾平凹的写作在“性情”中游刃有余，它在常规化的边界撕扯开一道裂罅，那里洋溢着无尽的秦地文化意味。

读读贾平凹那时的作品，都是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下充分表现男女性情。天狗（《天狗》中的人物）36岁尚未娶妻成家，对师母情有所钟而想入非非。不想师傅中途遇难，瘫痪在床，师傅做主让天狗和师母结合，而天狗勇敢承担起一家人的义务，却并不完成多年的宿愿。在对性的努力压制中，细致委婉地展示了性的意识和各种心理，同时道德升华也得到充分完善的表现。师傅以自杀成全了天狗和师母，又一次给性情的细致表现提示了道德高尚的背景。

《逛山》中的那个柳子言，则充分表现了性情的话语如何向着怪诞一方发展。这个年轻英俊的风水先生类似古代民间知识分子。他对四姨太一见钟情，想入非非，却没有行动，与其说他怯懦，不如说他更偏爱沉迷于性幻想。他的行动无力，愚蠢，甚至被人打断一条腿，他唯一一次挺身而出却又被下人愚弄。小说正在这样的情境中，对人物的心理展开细致而美妙的描写。他对性诱惑的逃避，恰恰给性诱惑的细致展示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这个柳子言期待诱惑又逃避诱惑，由此既展示了“山野风情”那些超越文明生活规范的性场景，并且蒙上了一层温馨而感伤的面纱。这些关于性情的故事，又由于地缘文化转而变成对“人性”的探索思考。

这种“性情”总是打上了风土人情的烙印，以至于贾平凹要把它们推向更具怪戾特征才能显示出它的独特意味。那个五魁从16岁开始干背新娘的活计，这使年纪轻轻的五魁过早地陷入了性幻想的焦虑中。遭土匪抢劫却为能与新娘相拥为伴而感到庆幸，捏一双女人的小脚“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挺身而出救出新娘，理由是新娘是“白虎星”（这又是性话语），乃至土匪唐景也是一次乱伦的结果。性情的话语支撑着故事的源头和各个关节。在后来的岁月里，五魁在柳家大院扛活，为的是能体味少奶奶的音容笑貌。与对女性温情脉脉的幻想相平行的虐待女人的叙事也在展开，它映衬了五魁性幻想的美好和精神之高洁。终至于五魁救出女人，在山野同居。然而，面对着性诱惑道德感却又油然而生，一个血性男子对活生生的心爱的女人退避三舍。在道德上成全五魁是必要的，这是性的话语更加详尽更加怪戾

地向前推进的必要条件。果不其然，这个菩萨一般的女人却压制不住如火的性欲，偷偷在干着与狗交媾的勾当，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当然击碎了五魁的道德感，女人也以身殉情（还是殉德？）。贾平凹的性情在追寻“文化”的道路上，必然向着怪异和邪狎发展，非如此不能有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文化是什么？不就是现代之外的异端或不可理喻的他者吗？

这就不难理解，贾平凹一直在写和要写出的实际上就是“性情”二字，特别是处在秦地文化区域里的人们。这种“性情”以地方文化为依托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脱离了这种地域文化，贾平凹的性情必然单薄；同样，如果离开了性情，贾平凹的文化就没有血肉。而二者的融合，贾平凹把新时期关于“人性”和“人道”的叙事推向了极致，只有他不是在意形态反思性的语境中讲述人性故事，那是扎根在西北土地上的生命存在，人性与文化获得了超出历史及现实的意义。

1987年《收获》第一期发表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同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浮躁》写的还是贾平凹的商州文化，或者说是其概括和总结，只是加重了现实关怀，专注于描写贾平凹过去小说并不常见的关于当代农村经济变革的现实问题。小说取名《浮躁》，即是说，小说试图表现那个时期经济变革大潮带来的浮躁风气，人们的行为、心理和价值取向都陷入浮躁之中。就在当时，贾平凹的这部作品无疑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关注现实而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容量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贾平凹既抓住农村改革涌动的大潮，表现农民企图脱困的热切愿望，也揭示出那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和心理。这在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时期，这是它引起关注的重要标志。然而，事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贴现实太紧太近，就成了这部作品局限性的问题所在。其一，用“浮躁”来概括那个时期的改革大潮的涌动，也显得过于简单片面，如果要揭示那个时期的问题，并不是“浮躁”二字可以概括的，“浮躁”充其量也只是表现形式，一些表面现象而已。中国社会在那个时期聚集着多种矛盾，举凡在制度、权力与特权腐败、农村的贫困化、改革方向不明确、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等等，都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作家对现实的思考，显然没有在这些更具有症结性的问题上达到深度。其二，文学对现实下诊断实在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文学只是以作家的个人敏感去表现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学无疑有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然而不是那种直接的宣告，而是以文学形象说话。如果重提现实主义原则，马克思当年就说过的不应当是席勒式的概念化地表达倾向，而应当是莎士比亚式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马克思的经典教诲，恰

恰在众多的现实主义写作中被遗忘了。贾平凹这部作品，就是太想直接对现实发言，太想以最简明扼要的概念概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显然悖离了贾平凹的创作本色。

《浮躁》发表后不久，熟知贾平凹创作的陕西评论家李星就发表评论（《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李星充分肯定了《浮躁》的现实意义：“它比平凹以往的作品更宏阔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也比平凹以往的作品更突出更全面从而也更准确地表现了作家自己的思想和人格。”^①李星看到这部作品存在着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与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方法的矛盾，但李星似乎更强调面向现实的意义，他以为贾平凹既想与现实、与人民发生联系，却又感到与他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念有冲突，在强调现实性的意义上，李星也陷入了矛盾。在我看来，贾平凹小说叙述的现实关怀必然是一种沉着于他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念之中的思想意向，在《浮躁》中，二者无法达成一致。对现实的急切表现占据了主动，那些浮躁的人和事似乎要成为叙述的主导，它们与文化及性情的描写构成相当紧张的冲突。很显然，对现实的过于直接急迫的表现，限制了贾平凹的小说叙事在文化与性情方面的从容发掘。而且正反两方面的二元对立太鲜明，金狗和田中正的斗争，像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演。贾平凹自己似乎也并不十分满意这部作品，贾平凹承认，他写《浮躁》时，作者亦是浮躁的。“浮躁”是一个很表面、很浮浅的词，它既不能概括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概括贾平凹这部作品的意义。如果说贾平凹有浮躁的话，那就是他太急于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他过于急切找到一个时代的总体性标识。而这点并不是文学作品可以做得到、做得好的。抛开这点来看，贾平凹的这部作品仍然有它的独特价值所在。

不管怎么说，文学对现实的表现还是有其意义的，尤其是当变革构成中国社会的首要特征时。《浮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写出了体制的松动，旧秩序的动摇；人心点燃的希望，不屈的挣扎与奋斗……身陷于贫困中的人们，是如何渴望脱贫致富。他们与河流搏斗，为的是获得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也确实有一种改变生活的愿望和情绪在躁动，仙游川、两岔乡、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都涌动着一种热潮，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各阶层都在渴望一种新生活。金狗、福运、雷大空等人，他们凭着一股野性本能去追逐时代的变迁，也创造属于自己的

^① 参见李星：《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原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引文参见：《贾平凹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编，第1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历史。金狗的奋斗也反映了青年一代农民在变革时代的生存渴望。另一方面，小说对权力关系的揭示也相当尖锐。随着历史变革的到来，原有权力关系格局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可以看到，在中国权力是怎样深地掌控着社会，权力的运作赤裸裸且蛮横无理。我们也开始看到，改革开放终究有可能瓦解原有的权力体系，至少引起权力的格局改变。

当然，对现实的表现实际只是一个构架，贾平凹真正感兴趣，或者说他得心应手的还是那些人伦性情。小说在“改革”的现实表象下，隐藏着贾平凹过去一直苦心经营的“性情”。因为这些“性情”弥漫于其中，使得小说的韵味依然十足。因为贾平凹有能力透过现实看到文化和人性，他的小说总是以超出现实、不被现实所困而高人一筹。即使如此急着要对现实下诊断的作品，贾平凹的文化底蕴依然可以化解现实的直接羁绊，它使《浮躁》不那么“浮躁”。

《浮躁》中的人物既对应现实改革的诉求，同样浸含着文化韵味。这些人物的独异之处在于，他们总是被打上某种文化印记。金狗身世奇特，与众不同，胸前有墨针的“看山狗”图案，这就造就了他日后不安分不寻常的天性。金狗与小水青梅竹马，却迟迟不能表白，结果让英英取得了主动委身于他的机会，一桩美好姻缘就这样变了味，酿成了一系列别别扭扭的恩怨。小水嫁给一个短命鬼，年轻就守寡。写寡妇是贾平凹的拿手好戏，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意味着故事多。金狗直到后来福运死了才又和小水走在一起，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绕了一个圈又回去了，但中间的阴差阳错又是小说叙述所必需的，贾平凹需要的“性情”就从这些缝隙间流露出来。贾平凹的性情总是有正反双重含义，它混合着圣洁/欲望、隐忍/放荡、合理/非法等奇怪的对立面。其正面的谱系有一系列的人物，其反面也有一系列的人物，有时可以一起混合在某个人物身上。贾平凹的小说也因此能写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的人物总是在文化规范体系边缘行走，他们时时处于僭越伦理道德的危险境地。金狗和英英、小水、石华几个女人的关系，没有一件是得体的和合乎伦理纲常的。似乎只有非法的反常的情欲关系，才能显现人的“性情”，才具有复杂的文学意味。恰恰依靠了这些对人伦关系的非同寻常的书写，贾平凹的小说还是能写出人生的苦涩，写出活生生的人性，写出生活不可摆脱的那种宿命。

写完《浮躁》，贾平凹认识到自己以这种方式来把握现实吃力不讨好，也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特长，所以他一再申明“我再也不可能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他认为这种写实的办法，对自己“并不适宜”，对自己

是“一种束缚”。写《浮躁》对于他是一次修性练笔的手段^①，似乎更明白自己的艺术道路该往哪个方向伸展了。然而，贾平凹的写作是否真的可以摆脱现实束缚还值得怀疑，他或许可以离开现实，但现实却随时裹挟着他。

二 《废都》的文化想象与批判性情境

贾平凹有相当一段时间深藏不露，既是隐忍不发，也是潜心修炼。1993年，贾平凹还是突然出现，让文坛猝不及防。贾平凹说想避开现实也许是真的，但现实由不得他的意愿。他的作品来到现实中，现实中的人们就会依据现实来读解它的意义。《废都》这样的书名其实还是与《浮躁》如出一辙，还是在应对现实，还是要对现实宣判诊断。

他也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他显然也是为九十年代初的现实所触动又一次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试图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有历史的敏锐性，九十年代初的要害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八十年代终结的后遗症。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仅茫然无措，也处于失语的困扰中。王朔的调侃替代了知识分子话语真空，但却替代不了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还是处在那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对王朔进行了集体的围攻。知识分子的话语以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达，王朔不幸成为杂语喧哗的对象。失语后的复活没有别的方式，只有强烈的批判性，矫枉必须过正，下一个对象是贾平凹，他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知识分子重新出场较量的对象。因为贾平凹唤起的是文化的和道德的记忆，道德话语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话语，是在他牙牙学语就掌握的语言。那时对贾平凹的批判集中于露骨写了性，而批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多作品都写了性，也露骨得可以，中国古代的就有《金瓶梅》，西方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现代的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怎么都成了名著？而贾平凹写性就不能露骨？这不是问题实质。

当然，无庸讳言，“性”在这部作品中十分醒目突兀。“性情”本来就是贾平凹的突出之处，原来的“性情”与地域文化和山野风情结合在一起，“性情”带着自然的朴实和率真。现在，“性情”突然赤裸裸呈现出来，如此醒目，如此绝对和极端，让人猝不及防。

实际上，这里的“性情”虽然离开了乡土民俗，还是有另外的背景，那就是民间的文人传统、典籍字画以及野史笔记。这是与原来的山野风情同

^① 李星：《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参见《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45页。

属一类的本土文化资源，只是比山野风情雅、比正统典籍文化俗的民间文人传统。在精神气质上，它属于有别于儒家正统的道家邪狎一类；在文本形态上，它属于野史笔记禁书一类。贾平凹实际上带着文化想象，带着他对当代文化现实和文化遗产的评判来写作《废都》，他要找到超越当代文化溃败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性情”文化，并且在文化的传承脉络中，在九十年代浮出地表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中找到根基。这种文化即使在历史传统也是非主流的，被压抑的；正因为此，贾平凹可以设想它更具有人性的本真性。因而它与性情，或者与纯粹的性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说白了，它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兴盛的“性文化”的集大成。这又是对“文化之根”的重新想象，这是他独树一帜另辟蹊径的文化想象。他不仅超越自己的“山野风情”，还有可能超越莫言的“红高粱”燃起的关于生命热力的浮夸想象。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文化想象，是扎根于生命本体，扎根于每一个萎顿的人们的肉体中，它不需要对自身的狂野有多少要求，只要期待贤淑温柔的女人出现就可以重振雄风。在这全部关于身体的想象中，都通向文化和审美的想象，它仿佛是从身体出发、要抵达重建文化与审美的一项庞大事业。然而，这种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却不是深陷现代性之中的知识分子所熟知的文化背景。知识分子还是要基于时代的精神重建，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读解贾平凹和庄之蝶，这就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庄之蝶在九十年代初出现，全然是一个文化上的另类。人们看清了他来自那些古籍，但却并不打算了解和认真对待贾平凹的意图。在“废都”背景上出现的庄之蝶确实难以辨认。他作为西京城里的名人，他的暧昧的知识分子身份，他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中国当代小说中惯常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庄之蝶有一种专注与沉迷的气质，这就有转向自我内心的潜能。而进入内心要事先克服身体的某个器官，不想这个器官出了问题，这就使进入自我的内心要长久地停留于身体的这个器官上。因而贾平凹要通过身体进入灵魂，这才能触动他所理解的“精神废墟”问题。而身体与贾平凹所擅长的性情自然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于是，贾平凹就可以倾注笔墨去表现庄之蝶的“性”。

贾平凹本来是要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作出描写，这种状况总是要在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来书写。但这种状况实在不是久居秦地的贾平凹所熟悉的——他熟悉的是山野风情、传统典籍和民间文化。贾平凹显然是把“现代知识分子”这个命题做了置换，他要写出的或许并不是当代的“精神废墟”，而是传统至今的那种文化精神的颓败。贾平凹把知识分子的颓败

史，把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废都”的描写，还是改变成对传统文人的性情的描写。庄之蝶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更像是一个传统文人。然而，这样的文人在当代文化中如何有真实存在的语境呢？这就是贾平凹的难题，这样的难题却不是身处现代性困境中的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并不是直接回应现实的文化/精神颓败问题，而是绕了一个大圈，这么大的圈，就像是一次没有归期的放逐了。庄之蝶唤起了古典时代的文化记忆，这是古典时代的文化英雄，贾平凹力图让我们去回想古典时代的文化，也试图让我们去思考当下文化颓败的根源——古典时代的文化已经颓败，庄之蝶无法成为挽救文化的英雄，相反，他的失败本身表明传统拯救现代的失败。

就这样，贾平凹把一个本来是指向当代现实及其精神的叙事，其实是转向了古典传统在当代的命运的主题上——他当然是试图以此来回答当代颓败的病根所在。这样的诊断当然有贾平凹的独特性，但也未尝不是偏激与片面（片面的深刻？）。这样的主题，其实是贾平凹在九十年代的感悟，一直处于西学潮流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沉迷于传统，还是逃离传统；不管是肯定还是拒绝，这仿佛都是八十年代的仓促紧迫的任务，九十年代其实只有实用主义，并没有深远的追思和未来的构想。贾平凹到底是太落后还是太激进？这二者在贾平凹身上达成一个奇怪的统一，这就造就了庄之蝶这样奇异的人物，他无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被识别，他是一个整全的“他者”。于是，庄之蝶的身体和精神只能在独特的语境中释放，那就是在性欲的放纵中与对文化典籍的尊崇中来展现庄之蝶的“废都”世界。

也只有在这种逻辑上，才能理解唐宛儿何以可以把“性交”当成是文化奉献，当成接近文化的一种方式。她说道：

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到了，你和一般人不一样，你是作家，你需要不停地寻找什么刺激，来激活你的艺术灵感。……但你为什么阴郁，即使笑着那阴郁我也看得出来，以至于又为什么能和我走到这一步呢？我猜想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但起码暴露了一点，就是你平日的一种性压抑。……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我也会来调整了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反过来说，就是我为我活得有滋有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

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①

唐宛儿如此表白，似乎她不是潘金莲式的妇人，而是献身文学事业、拯救文学天才的纯情少女，他们的交欢因而具有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现在，文学存在的源泉动力都来自女人，唐宛儿让庄之蝶重新感觉到他又是一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② 唐宛儿的肯定是个双重肯定，她肯定了庄之蝶作为男性的健全的性功能，并且肯定了庄之蝶文化名人的现实地位——原来这二者是沟通的。性情中如何有文化流露出来，这是贾平凹的困局，现在似乎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庄之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现实语境中，他没有现实的对应的所指，他不是现实的存在者。庄之蝶是古典时代的破落士大夫与秦西乡间文人奇怪的混合物，他完全疏离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那样的历史断裂实际与他无关，他未曾经历过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冲突。庄之蝶的记忆只有古典的和乡间的记忆，而八十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的震撼，未曾在庄之蝶身上留下印记。他存在于唐宛儿们和典籍中，这就可以理解庄之蝶形象的真实意义，他所勾连起来的乃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命运这一主题。“废都”，并不是现代精神的废都——对此贾平凹历来没有兴趣。在九十年代初，一个正在勃发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贾平凹或许感觉到，那个传统文化已经颓败，庄之蝶本来是要承担重建“性情”文化的重任的，但庄之蝶这样的人物已然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边缘人物。他的出场就是一个阳痿患者，他在唐宛儿的肉体上霍然痊愈，而且愈战愈勇。拯救文化，拯救庄之蝶式的人物，有什么途径呢？只有性和典籍。或者，它们二者是一回事，本质上是一种颓败的肉体如何重新焕发生命力的问题。

很显然，贾平凹并不愿意简单平面地描写性爱，他要把性爱作为肯定文化的一种形式。这不只是女人的语言/誓言的肯定，还有那些文化典籍作为铺垫或背景，它们构成了一种意境，依赖古典记忆超越当下的困局。在那些寻欢做爱的时刻，那些女人经常手持《红楼梦》之类的书籍阅读^③，诸如《浮生六记》《影梅庵忆语》《闲情偶寄》之类的古籍读本使唐宛儿获益匪

① 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② 同前，《废都》，第111页。

③ 同前，参见《废都》第275页。

浅。这些女人也自觉跨越时代界线，等同于古典时代的淑女妇人甚至秦淮名妓（如董小宛）。这些女人的错觉显然是贾平凹要跨越历史界线的想象——抹去古典时代与当代的时间标记，重新恢复文化的历史记忆，在性/情中历史可以消解，文化更为深层的意蕴可以绵延而至。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史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转向古典时代，这是贾平凹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无法真正书写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荒凉，或许当代知识分子始终是他所不认同的一种族群，或许他认为与他无关，他是生活在古典时代的人，他所痛心的是古典时代的颓败，是庄之蝶这样的人物的颓败。他的错误或许在于，庄之蝶这样的“牛鬼蛇神”，已经被当代文化驱魔了，已经逐出了当代文化的中心地位，庄之蝶设想他的存在价值，要恢复他的神圣地位。在贾平凹的写作谱系中，庄之蝶实际上可以偶然从那乡间文人或术士那里找到雏形，他们可以与乡野风情构成一致的语境；他们往前伸展就成了庄之蝶，而庄之蝶则要与古籍野史相适应。总而言之，贾平凹并不是在当代主流文化的背景或语境中来书写当代精神荒凉的主题，他的文化记忆主要还是那些富有地方乡土韵味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延伸可以沟通中国传统古籍，那些野史笔记，那些禁书另册，与山野风情还能异曲同工。贾平凹进一步设想，这些女人本来就那些古典读本中脱胎而来，甚至连阿灿都谙熟“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他们在造爱中“把那些语言说出来”，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都试过了”。这是一次次贯穿着文化记忆的交媾，对古籍的重温成为“性情”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

性情再一次从典籍那里获得了内涵，它们在“本真性”这一意义上达成了统一，并获得提升，那就是它们都是源于“内心真挚”的祈求。从身体终于抵达心灵，性情也就超越了“性欲”，根源在于内心真实，它们不只是文化理想，而且是美学理想——关于美文理想。本真的性爱、本真的文化、本真的美文，终于三位一体。作为本真的性情文化的英雄庄之蝶倒下去了，但美学还可以站立起来。这不是简单的填补，更重要的是要有审美追求。那些古典文本的存在要与性情融为一体，它们共同创造着新的美学理想。那些古典文本让他感悟到重大的价值。他在“后记”中写道：

……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圇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

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

贾平凹在这里表达了对古籍的尊崇，庄之蝶这个形象表现的性爱与文化典籍，虽然无不回旋着一种失败的意味，但其中却有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从远古时代一直贯穿下来，一直在“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主流文化的另一侧面游荡，它在古典时代就是孤魂野鬼，在现代依然是幽灵。在这个“废都”的时代，一切可以重新上演。九十年代是个文化重建的时代，贾平凹想象着一个有着中国民间还带着乡土气息的本真性的文化绵延不断，这是中国本真性的文化的复活。庄之蝶倒下去了，生死不明，下落不明，但那种文化理想，那种美文可以在“废都”里复活。在这里他要重建九十年代的美学理想，找到一条古典禁书在当代复活的道路。《废都》甚至以一种自残的写作形式，那么多的省略方框框，强行把自己和禁书等同一体，来发掘一种压抑的死亡的美学。这是一次祭悼，更是一次出发的宣誓。确实，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处于困难的茫然无措时期，贾平凹试图越过当代所有的文学既成阶段，作一次胆大妄为的写作，一次关于文化和美学重建的梦想，这样的梦想远离了现代性的事业，也背离了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重新出发的立场和方向。但是贾平凹顽强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几乎一夜之间就逃逸出当代知识分子的视野。

《废都》抓住了时代潜意识，又远离了时代，如此之当下，实际又如此超出时代。那仿佛是一部放逐和逃离之作。或许贾平凹过于大胆，他在庄之蝶身上注入的很可能是反现代的思想；庄之蝶只有沉迷于性欲，那是他逃离现代而无可作为的苦闷，那是因为他断了传统却又与现实无缘。贾平凹对一个时期的诊断不可谓不尖刻，但他根本上是超出和疏离这个时代，他写的不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而是古典时代在当代的没落史。这就不是九十年代初的“儒教经典”所能担当的道义，只能是野史笔记或“美文”才能扛起的重任。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他沦落为被拯救者。就此而言，贾平凹还是看清了真相。他寄希望于庄之蝶，他在肉体上可以重振雄风，但在文化上却只颓败。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废都》的真实意图。

确实，在今天，我们评价贾平凹这样的文化意图和美学追求，或许还有些困难，它不是在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上可以作明确决断的选择。在九十年代初，贾平凹的文化企图太没落，又太超前。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悲歌，

实际上是古典文化及其美学复活的挽歌。它就站立在当下文化“废都”上，眺望古典时代的废墟。庄之蝶唱的仿佛是另一曲《牡丹亭》：原来数风流人物，似这般早已付于断井残垣。未来多少年之后，谁能说贾平凹的想象不是神奇的预言呢？

因此，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和攻击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其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那些批判试图恢复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而贾平凹的复古与怀旧的悲情，则是反现代性的另一种文化立场，直到今天我们才会开始认真对待。

三 从《废都》到《秦腔》：阉割的必要

九十年代上半期，对贾平凹的批判曾经一度构成知识分子出场的话语，众声喧哗，但饱含着道德主义激情，它构成了知识分子随即展开的对市场经济和文化商业主义批判的序曲，随后还有时代的最强音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到这里，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出场就算是完成了亮相。放在历史语境中来看，对《废都》的批判不管有多么严重的错位和过激之处，它都是必要的，而且它也造就了《废都》作为一个时代情绪和话语的聚焦目标。对于贾平凹本人来说，他也是咎由自取，他试图对历史发言，给时代提供一个精神镜像和解决的答案。这使他的《废都》充斥了太多观念性的东西，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问题；那是知识分子的存在状况问题；那是一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情和颓败的问题；那是文学写作与传统典籍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贾平凹可以在庄之蝶这样的人物身上能解决的。而庄之蝶周围的那些女人，除了肉体，并无更多的现实内涵。《废都》试图与时代结合得紧密，但真正起作用的人物只有庄之蝶一人。在历史语境中，本来空灵的庄之蝶被做实了——他不得被看成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贾平凹一直要写出一种“有”，一种期待解决的精神焦虑，让它在场，让它在文学话语中显现出来，这就成为一个时代的把柄，人们都可以看到的把柄，它必然要成为那个失语时期的话语之靶。所以贾平凹也并不冤，《废都》作为那个时期的牺牲品，是知识分子重新出发的祭品，这是一个难得的有分量的祭品，这就是贾平凹才能做出的特殊供奉。作为一次声势如此浩大的重新出发，这个祭悼是必要的和值得的。

而在今天看来，《废都》的文学水准显然并不低，何以要遭致如此严厉的批判，会让人们大惑不解。平心而论，《废都》比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多数小说，在文学性上，或者在叙述形式上，或者在艺术语言上，都属于上乘之

作，但毫无办法，谁也拯救不了《废都》。《废都》就像一张招贴画，被牢固地张贴在历史之墙上，谁也揭不下来，无法还其纯粹的文学之身，只要揭下来，它就破碎不堪。它已经与那段历史紧紧地粘附在一起，那是它的葬身之地，它是它（历史）的碑文，只有在铭刻着自己的死亡时它的意义才能全部显现。

《废都》在很多方面都表示着终结与开始，它以“有”开始，这个“有”被历史狙击，被历史俘获，恰恰说明历史是多么需要它的给予，它的无私赠予。贾平凹经历过九十年代的磨练，那是炼狱般的磨练，他要逃离《废都》的记忆和阴影，他甚至不敢正视它。《白夜》《高老庄》《狼的故事》，这些作品不能说写得不好，但都没有切中文学的和时代的要害。它们是贾平凹退避三舍虚与委蛇的掩饰，作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贾平凹在这一个阶段没有看清自己的方向，他没有成为自己的主心骨，他没有正视《废都》之死，在《废都》里死去这个事实。而《废都》之死是一场意外伤亡，从历史来看虽然并不冤枉，但从贾平凹来看，他难道没有冤屈？他不想鸣冤？他不想报复？他内心的仇恨怎么才能公之于世？看看那个老李尔王是怎么刺瞎自己的双眼，在旷野里呼叫？他为什么不呼叫？他要把怨恨全部转化为一个怪诞的动作，大师，真正的大师只要一个动作就行了，这个动作看似不经意，看似无所谓，然而，一个动作就可以表露全部的内心隐忧，表露全部的怨气和仇恨。点到为止啊，这就是高人一筹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在等待贾平凹做出，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动作，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

直到2005年，贾平凹才做出这个动作，就一个动作就化解了自己心中的冤仇，就把一个过往的不可解开的历史死结打开了，就能够轻松自在地向前看。这段历史怨恨只有自己能够解开，只有自己才能超越。其超越的方式只有在文本中，在真正具有破解性的文本建制中，在有贯穿自己历史的美学创生中才有意义。这就是《秦腔》的出现，那个阉割动作的出现，那是怀恨在心的阉割，那是解开历史的阉割，那是重新展开的美学追寻的阉割。

小说在引生偷了白雪的胸衣被饱打一顿后，引生痛不欲生，小说这样写道：

我的一生，最悲惨的事件就是从被饱打之后发生的。我记得我跑回了家，非常地后悔，后悔我怎么就干了那样的事呢？……我掏出裤裆里的东西，它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名声，它给毁了，我就拿巴掌扇它，给猫说：“你把它吃了